

文献学读书记

乔秀岩 叶纯芳 著

古典学文明

甘阳 吴飞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lassics & Civilization

文献学读书记

乔秀岩 叶纯芳 著



Classics & Civilizatio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读书记 / (日) 乔秀岩, 叶纯芳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9

(古典与文明)

ISBN 978-7-108-06160-7

I. ①文… II. ①乔… ②叶… III. ①文献学 IV. ①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8050 号

责任编辑 钟 韵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6209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 数 318 千字 图 18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6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古典与文明”丛书

总序

甘阳 吴飞

古典学不是古董学。古典学的生命力植根于历史文明的生长中。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教育与古典研究的兴趣日增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学人走向文明自觉的表现。

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是在 19 世纪的德国才得到实现的。但任何一本写西方古典学历史的书，都不会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写，而是至少从文艺复兴时候开始，甚至一直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乃至古典希腊本身。正如维拉莫威兹所说，西方古典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面对希腊罗马文明，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对西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是西方文明复兴的前奏。维吉尔之于但丁，罗马共和之于马基雅维利，亚里士多德之于博丹，修昔底德之于霍布斯，希腊科学之于近代科学，都提供了最根本的思考之源。对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的大规模而深入的研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获得了思考的动力。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古典学术，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土壤。数百年古典学术的积累，是现代西

方文明的命脉所系。19 世纪的古典学科建制，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随着现代研究性大学和学科规范的确立，一门规则严谨的古典学学科应运而生。但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大学古典学学科的真正基础，乃在于古典教育在中学的普及，特别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曾长期为欧洲中学必修，才可能为大学古典学的高深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

19 世纪古典学的发展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带动了新一轮文明思考。例如，梅因的《古代法》、巴霍芬的《母权论》、古朗士的《古代城邦》等，都是从古典文明研究出发，在哲学、文献、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尼采的思考也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20 世纪以来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福柯等人的思想，无不与他们对古典文明的再思考有关。而 20 世纪末西方的道德思考重新返回亚里士多德与古典美德伦理学，更显示古典文明始终是现代西方人思考其自身处境的源头。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离不开对古典文明的深入发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学绝不仅仅只是象牙塔中的诸多学科之一而已。

由此，中国学界发展古典学的目的，也绝非仅仅只是为学科而学科，更不是以顶礼膜拜的幼稚心态去简单复制一个英美式的古典学科。晚近十余年来“古典学热”的深刻意义在于，中国学者正在克服以往仅从单线发展的现代性来理解西方文明的偏颇，而能日益走向考察西方文明的源头来重新思考古今中西的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学界现在已

经超越了“五四”以来全面反传统的心态惯习，正在以最大的敬意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古典源头。对中外古典的重视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界的逐渐成熟和从容，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能够从更纵深的视野思考世界文明。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高度重视西方古典学丰厚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古典学的局限性和多元性。所谓局限性是指，英美大学的古典学系传统上大多只研究古希腊罗马，而其他古典文明研究例如亚述学、埃及学、波斯学、印度学、汉学以及犹太学等，则都被排除在古典学系以外而被看作所谓东方学等等。这样的学科划分绝非天经地义，因为法国和意大利等的现代古典学就与英美有所不同。例如，著名的西方古典学重镇，韦尔南创立的法国“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不仅是古希腊研究的重镇，而且广泛包括埃及学、亚述学、汉学乃至非洲学等各方面专家，在空间上大大突破了古希腊罗马的范围。而意大利的古典学研究，则由于意大利历史的特殊性，往往在时间上不完全限于古希腊罗马的时段，而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研究多有关联（即使在英美，由于晚近以来所谓“接受研究”成为古典学的显学，也使得古典学的研究边界越来越超出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

从长远看，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在空间意识上更应参考法国古典学，不仅要研究古希腊罗马，同样也应包括其他的古典文明传统，如此方能参详比较，对全人类的古典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在时间意识上，由于中国自身古典学传统的源远流长，更不宜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期，而应从中国

古典学的固有传统出发确定其内在核心。我们应该看到，古典中国的命运与古典西方的命运截然不同。与古希腊文字和典籍在欧洲被遗忘上千年的文明中断相比较，秦火对古代典籍的摧残并未造成中国古典文明的长期中断。汉代对古代典籍的挖掘与整理，对古代文字与制度的考证和辨识，为新兴的政治社会制度灌注了古典的文明精神，堪称“中国古典学的奠基时代”。以今古文经书以及贾逵、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等人的经注为主干，包括司马迁对古史的整理、刘向父子编辑整理的大量子学和其他文献，奠定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中国古典学体系。而今古文之间的争论，不同诠释传统之间的较量，乃至学术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古典学术传统的丰富性和内在张力的体现。没有这样一个古典学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秦汉至隋唐的辉煌文明。

从晚唐到两宋，无论政治图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旧有的文化和社会模式已然式微，中国社会面临新的文明危机，于是开启了新一轮古典学重建。首先以古文运动开端，然后是大量新的经解，随后又有士大夫群体仿照古典的模式建立义田、乡约、祠堂，出现了以《周礼》为蓝本的轰轰烈烈的变法；更有众多大师努力诠释新的义理体系和修身模式，理学一脉逐渐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最终胜出，成为其后数百年新的文明模式。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古典学时代”，或不为过。这次古典重建与汉代那次虽有诸多不同，但同样离不开对三代经典的重新诠

释和整理，其结果是一方面确定了十三经体系，另一方面将“四书”立为新的经典。朱子除了为“四书”做章句之外，还对《周易》《诗经》《仪礼》《楚辞》等先秦文献都做出了新的诠释，开创了一个新的解释传统，并按照这种诠释编辑《家礼》，使这种新的文明理解落实到了社会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宋明之间的文明架构，仍然是建立在对古典思想的重新诠释上。

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之后，清代开始了新的古典学重建，或可称为“中国的第三次古典学时代”：无论清初诸遗老，还是乾嘉盛时的各位大师，虽然学问做法未必相同，但都以重新理解三代为目标，以汉宋两大古典学传统的异同为人手点。在辨别真伪、考索音训、追溯典章等各方面，清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成为几千年传统学术的一大总结，而且可以说确立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前代习以为常的望文生义之说，经过清人的梳理之后，已经很难再成为严肃的学术话题；对于清人判为伪书的典籍，诚然有争论的空间，但若提不出强有力的理由，就很难再被随意使用。在这些方面，清代古典学与西方 19 世纪德国古典学的工作性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清人对《尚书》《周易》《诗经》《三礼》《春秋》等经籍的研究，对《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春秋繁露》等书的整理，在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后人无法绕开的必读著作，更何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古代学术的总纲。而民国以后的古典研究，基本是清人工作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不妨说，汉、宋两大古典学传统为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提供了范例，清人的古典学成就则确立了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规范。中国今日及今后的古典学研究，自当首先以自觉继承中国“三次古典学时代”的传统和成就为己任，同时汲取现代学术的成果，并与西方古典学等参照比较，以期推陈出新。这里有必要强调，任何把古典学封闭化甚至神秘化的倾向都无助于古典学的发展。古典学固然以“语文学”（philology）的训练为基础，但古典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以及研究方法等，往往并非来自古典学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晚近数十年来西方古典学早已被女性主义等各种外部来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所渗透占领，仅仅是最新的例证而已。历史地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所谓考据与义理的张力其实是古典学的常态甚至是其内在动力。古典学研究一方面必须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古典学的发展和新问题的提出总是与时代的大问题相关，总是指向更大的义理问题，指向对古典文明提出新的解释和开展。

中国今日正在走向重建古典学的第四个历史新阶段，中国的文明复兴需要对中国和世界的古典文明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客观地说，这一轮古典学的兴起首先是由引进西方古典学带动的，刘小枫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在短短十五年间（2000—2015年）出版了三百五十余种重要译著，为中国学界了解西方古典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掘中国自身的古典学传统提供了参照。但我们必须看到，自清末民初以来虽然古典学的研究仍有延续，但古典教

育则因为全盘反传统的笼罩而几乎全面中断，以致今日中国的古典学基础以及整体人文学术基础都仍然相当薄弱。在西方古典学和其他古典文明研究方面，国内的积累更是薄弱，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因此，今日推动古典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首在大力推动古典教育的发展，只有当整个社会特别是中国大学都自觉地把古典教育作为人格培养和文明复兴的基础，中国的古典学高深研究方能植根于中国文明的土壤之中生生不息茁壮成长。这套“古典与文明”丛书愿与中国的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同步成长！

2017年6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	1
版本的缺环或历史概念的形成	23
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标准问题	49
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	83
《旧京书影 /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	148
学《中国版刻图录》记	181
影印南宋官版《周易正义》编后记	206
《毛诗正义》的历程	221
金刻本《周礼》商榷	243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周礼部》的文献价值	277
《仪礼疏考正》解题	305
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	
编后记	326

嘉定南康军刊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补修情况 374

师顾堂影印《仪礼正义》识语 395

《礼记》版本杂识 402

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编后记 422

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 456

后 记 489

札 记

《汉书》集注 22

孙觉《春秋经解》 47

云曰当名词解 140

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

叶纯芳

一、前言

每一个学科研究的成立，都有其深层的价值与意义，吸引后继者不断地投入这个行列中，深化研究的内涵，活络研究的生气。学术追求创新思想，但印象中的“文献学”似乎与这样的想法背道而驰。学习文献学的意义在哪里？教授文献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有正确的文献学知识，可以辨别资料的真伪、可以勘正古书资料的错误。当然这个答案确实是精通文献学后最大的获益，不过，学习文献学的目的若只围绕在“纠正错误”“避免错误”上打转，这样的学科似乎没有太大的魅力。

在古籍研究中，“内容”与“版本”原本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学者大多关注文本内容所隐藏的作者思想，不了解或者认为不必要了解版本的相关问题；而研究版本的学者则因深陷在版本的鉴定上，对文本的内容不关注或者已无力关注文本的内容。再加上学术研究的主流在于理解内容，进而提出各自的创见，对于版本目录上的问题，以为是枝微末节，不需花费时间探讨，只要

引用现成的工具书即可，导致二者渐行渐远，成为表面上互不相涉的学科。但相较于理解内容，笔者认为更亟须学者们理解的，是版本。

在《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的一年，笔者担任初审、通审的工作，这个表面上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却让我们从中领会文献学研究的极大兴味，又能让我们摆脱停留在“纠谬”阶段的消极意义，进而体会文献学研究的积极意义。是故，有了这篇文章的构想。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楚明白，本文所举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笔者在《儒藏》中心审稿时，针对实际发生的一些情况所提出的想法，通过这些例子，希望读者能够认同“理解版本”的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审稿时所提出的建议，有些或幸蒙整理者采纳，有些则否，相信会与实际出版时的情况有所出入。

二、理解版本的方法

（一）追踪线索

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不管是否经过文献学的专业训练，都知道第一步要从现有的善本书目、古籍线装书目中选择底本。看似再正常不过的步骤，却仍然常常发生选择错误的版本作为底本，原因在于不理解这些工具书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之善本书，以有特色、稀少的古籍作为收录的标准，以《五礼通考》为例，仅录有清

乾隆十八年（1753）秦氏味经窝的初印本与清抄本二种。若不了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体例，而认为此初印本为世上仅存的孤本，则会失去认识其他版本的机会。此处所著录的味经窝刻本，是王欣夫所藏，后有台湾圣环书局影印出版的初印本，不是秦蕙田此书最后的定本。卢文弨曾云：“《五礼通考》虽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参错不及细检处，须及今改订为善。”味经窝初印本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成后，秦氏就交付卢文弨等人审阅，“未即行世”，说明初印本是一种半成品，不可视其为定本。在初印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朱笔的校记，这些校记，大致上都吸收进后来的定本中。卢文弨阅毕致函给秦氏后（乾隆二十九年），至江苏采辑遗书、进呈四库（乾隆三十七年，1772）这段时间，初印本将众人校记吸收，在原版块上修改后印行，成为此书的“定本”，并且广泛流传，产生影响。若进一步言版本种类，除味经窝刻本外，有光绪六年（1880）江苏书局刻本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味堂翻刻江苏书局本，流传之广，可想而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味经窝刻本只有一部，仅仅说明有卢文弨等朱笔校记的初印本只有一部，手写批校自然唯一无二，不能因此认为味经窝刻本是孤本。

又如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根据《宝礼堂宋本书录》所载《资治通鉴纲目》嘉定己卯刻本的刻工资料，对照“北图本”之刻工，发现两本刻工相同，而推断“北图本”亦为宋本。又根据修补页所记刻工，知为移入南雍后刷印者。王氏所云之“北图本”，阙第三十二、四十卷，又卷

一抄补，则其所载之“北图本”，实际上为早期“北平图书馆”所藏书，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者（可参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而《宝礼堂宋本书录》所载本，才是现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卷四十六配一宋刻本、卷四十七至五十一配另一宋刻本的内容。若不明白“北平图书馆”旧藏书的历史，与今存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混为一谈，自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有些工具书是根据众多工具书所汇整的资料，大部分这类书籍没有一一核实资料的能力，若所根据的工具书出现错误，编纂者又无法察觉，只能沿袭错误，或因此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有京都大学所藏《春秋公羊传注疏》，京都大学藏本是所谓“十行本”，世传十行本大多是元版明修，为学界众所周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根据日本静嘉堂所藏《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推断京都大学藏本与静嘉堂藏本应是同版本，匪夷所思的是，静嘉堂藏本是“元泰定、至和间刊至明正德递修”，但《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对京都大学藏本却做出“据版式及刻工推考，乃金大定年间刊，明正德至隆庆间递修本”这样的推断。世存金刻本少之又少，金刊本经“正德至隆庆间递修”更是天方夜谭，此处所做的推断，恐怕是编纂者误涉“元泰定”为“金大定”所致。不了解十三经版本的相关问题，又对历代刻本没有基本的认识，极容易落入这种荒谬信息的陷阱中。

版本目录学家需要面对成千上万种古籍，只能根据每

部古书的客观情形做记录与鉴定，无法针对某一部古书从横向（同时代的不同版本）、纵向（版本的流传历史）做调查，古籍目录所记载的资讯，只能是古籍的表象。因此，理解版本的首要工作，是追踪线索，通过掌握这些线索，将所要整理的古籍做版本历史的串联，该选择哪本作为底本，便一目了然了。以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经部古籍首要参考阿部隆一先生的《中国访书志》《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其次，可参考张丽娟先生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顾永新先生的《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史部古籍参考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子部与集部虽无集中的版本鉴定工具书，但针对个别的古籍考证文章可以搜集参考。我们不会无理地要求古籍整理者都需具备版本鉴定的能力，但至少对各种古籍目录要有仅能当作理解版本的“线索”，不能当作是“定论”的认识。

（二）选择底本与参校本

一部水准之上的古籍整理，常常取决于是否选用了好的本子当作底本。有时候，这是一件难下决定的工作。选择好的底本，直接影响的是校勘记的多寡，许多人误以为校勘记越多，代表这部书的整理品质越好，其实不然。古籍整理的目的，是经过专业人士整理后，让这部古籍更方便读者阅读。若每页动辄十数条的校勘记，使阅读不断停顿，这样还不如看未经整理过的原书来得畅快。

以十三经附校勘记的《春秋公羊注疏》为例，从版本